

早年巴生潮州人社群初探¹

徐威雄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语系

摘要

巴生为巴生谷最早开发的地区，在众多的华族人口中，潮州籍仅占极少数。潮州人自十九世纪末移居巴生以来，形成一个鲜明的地方社群，他们组织乡团会馆，参与当地华社文教的建设，并长期操控了巴生杂货米粮行业。本文结合文献史料与田野调查的考察，从人口移殖、原乡籍贯、行业特色等各方的探讨，勾勒出早期巴生潮州社群的形成及其面貌。本文为华人方言群研究，也是属于巴生地方史的研究。

关键词：巴生、潮州人、潮州社群

¹ 本文原刊于《潮涌百年——巴生滨海潮州会馆一百周年纪念特刊（1917-2017）》（巴生：巴生滨海潮州会馆，2017，页213-221），原题作“早期巴生潮州人的移殖与行业”。今文略作修饰，并扩大篇幅，增补上最后一节，使内容更为完整。

Research on Chaozhou Community in Early Klang

SER Wue Hio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Abstrak

Klang is the earliest region to be developed in Klang valley area. Among the numerous Chinese there, the Chaozhou dialect ethnic community is a minority. Since the Chaozhou migrants came to Klang at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they have become a distinctive local community in Klang. They organized their association,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hinese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also dominated the groceries and rice trading for a very long time in Klang. This paper, by combining both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field works for review the immigrant, original home, business feature, outlines the appearance of the Chaozhou dialect community during the early Klang period. This paper serves both as a study on Chinese dialect community, and also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Klang.

Keywords: Klang, Chaozhou, Chaozhou dialect community

巴生（Klang）为雪兰莪的王城所在，也是巴生谷最早开发的地区。它的地理位置优良，扼控马六甲海峡，并拥有深水码头，东部则连接首善之区的吉隆坡，是半岛中部地区工商百货的枢纽。这样的历史与地理因缘，注定了巴生成为人口荟萃之地。

在雪兰莪的华人族群中，潮州籍居民属于较少数，大概占据华裔人口的第四位（詹缘端等，2016，页44-47）；而巴生作为一座华人稠密的都会，潮籍在其华人中的比例，相信与整个雪兰莪的比例也离不太远。然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巴生潮州人，自始便成一个鲜明的社群，他们组织乡团会馆，参与当地华社文教的建设，并长期操控了巴生杂货米粮行业。这些贡献都是巴生历史所无法省略掉的。

有关巴生潮州人的历史材料，至今仍没有很好的整理；相关的历史书写，除了吉胆岛因其特殊性而较受关注之外，巴生地区的潮人史近乎空白²。以下尝试依据贫乏的材料，结合一些田调口述，勉力重建起巴生潮人历史的轮廓，以为历史留下记录，并期望起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早期潮人的移殖及其人口

巴生的历史非常久远，从上世纪初出土的铜钟与铜鼓来看，学者鉴定属于越南东山文化的源流，大约在前三世纪的前汉时期。十五世纪马六甲王朝鼎盛时，曾将之纳入版图，由名将敦霹雳来管辖。在郑和下南洋的航海地图中，就标有“吉令”的地名，一般相信即为今天的巴生；据此可以想象，当时的巴生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停泊岸口了。从这些史迹来看，巴生似乎在很早以前就与中国发生了一些关联。

一直到十八世纪初，巴生才进入苏丹政治的阶段；而其近代意义的开发，应该是到十九世纪中叶才真正开始。巴生的开发是和卢骨、安邦等地的锡矿挖掘分不开的，这也正是华人进入巴生的契机，在开发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开发初期时，相信已有不少华人流寓其间，然而书阙有间，无法详谈。可以确定的是，1867年巴生战争（雪兰莪内战）爆发时，华人帮派也卷入战火中，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曾在主战场巴生一带活动过，他与手下大将赵煜在巴生都拥有不少的锡矿，据此相信，此时应该已有不少华工驻留于此。就文献所见，至迟七十年代初际，巴生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当热闹的华人区。根据一份1872年的游记资料，在巴生市内那条沿着巴生河岸平行的大街，当时就被称着“唐人街”（Chinese Street），从码头一直延伸有半哩长；文献也提及，当时已有载送华人矿工与锡米的轮船，往返于巴生河岸口与马六甲之间（J. M. Gullick, 2006, 页5、12）。对

² 上世纪中甸潘醒农所编《马来亚潮侨通鉴》（1950）中，有杨晴川《雪兰莪潮侨概况》一文，文中除了介绍吉隆坡外就是吉胆岛了，对巴生并没有特别的着墨。两年前出版的《海滨潮乡——雪隆潮州人研究》（詹缘端等，2016）则据一点文献记录和田野调查，作了简要的概述（页47-47），算是勉强弥补了一点空白。

此，1871到过巴生的依不拉欣（Munshi Ibrahim）也有近似的记载，可为互证。据其所述，当时巴生市区人口众多，其中华人的店屋很多，“华人的街道很长”（Mohd. Sarim Hj. Mustajab, Khazin Mold. Tamrin, 1990, 页17-18）。据此可见，最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华人已聚集于巴生的中心地带，成为商贩与劳动的主要人口，足以想象这已是一个热闹的货贾市集了。

1873年巴生战争结束，叶亚来决心重建吉隆坡，大批输入华人苦力，这个决策不但改变了吉隆坡的历史命运，也改变了巴生的人口结构。我们根据1876及1878年三份华工的名单与通知公函可知，这些运往吉隆坡矿区的劳工大都是先在巴生落脚（徐威雄，2013，页13-14）。于此可见，巴生是外人进入雪兰莪的主要门户，有理由相信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华工滞留在这里。另一方面，1874年拿律战争结束，邦咯条约签订后，也应有不少华工或华商从近打河谷往南迁徙，进入吉隆坡与巴生寻找新天地。1875年初，英殖民政府遣派戴德生（Davidson）到巴生任雪兰莪第一任参政司，雪兰莪纳入了英国的殖民版图，巴生的形势可谓大好，只是1880年英殖民政府将行政中心迁移到吉隆坡后，巴生的发展势头就缓滞了下来，最终被吉隆坡抛在后头。相信此时，也会有不少在巴生的华人陆续移徙到吉隆坡去淘金。

简要地说，十九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巴生华人社群的形成时期。据早期的文献，1875年的巴生市区内的人口大约800人，1894年增长至2,000人，1901年则有3,576人（J. M. Gullick, 2006, 页12），我们结合上述1872年游记的说法，此时的市区人口已是华人为主了，这里面相信有开采锡矿的，有做生意买卖的，也有从事农业垦殖的。在这个人口群里面，显然是以福建人（闽南人）为主。至于潮州人在巴生到底有多少数目呢？目前所见史料缺记，无法推考，不过从后来的人口数据来倒推，数量显然是很稀少的。我们且以吉隆坡作为参照，1891年吉隆坡的潮州人数量，也不过只有912人（陈剑虹，1997，页157）；据此可推，迟至十九世纪末，巴生市区的潮人大概不过百来人吧，相信这是很合理的推测。

从官方人口统计的资料来看，一直到1911年才有巴生潮州人的数据。我们根据《雪兰莪暨吉隆坡华人与潮籍人口统计表（1901-2010年）》（叶美霞，2017，页223-229），胪列出国家独立前巴生地区历年潮州人人口表，如下所示：

表一

独立前巴生历年潮州人人口表

	1911	1921	1931	1947
华人人口	10,503	15,119 ³	22,439	44,110
潮籍人口	589		2,416	5,239
所占华人比例	5.61%	5.4%	10.77%	11.88
所占华人位置	5	4	3	3

³ 这个“15,119”数据，是根据1921年官方数据中的“巴生”与“巴生（郊区）”二项数据（6,237+8,882）相加而来的（见叶美霞，2017，页224）。

在这个整理自官方数据的列表中，有几个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这里的巴生应该包括了市区及其郊区的人口（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只有1921年是将市区与郊区分开来的）。也就是说，这些巴生潮籍人口照理上是包括了吉胆岛的潮籍数据；第二，这些正式的官方数据，在与当时一些文献所记载的数目比较，明显是偏低的。试举例说明，1921年官方的巴生（包括吉胆岛）潮人数据仅占5.4%，约八百多人，然而同年一份吉胆岛渔民的请愿书里，提到岛上约有二千名居民（徐威雄，2017a，页203-204）。再有，1950年杨晴川所引用1947年的官方数据，谓当年巴生及港口区的潮州人“约二千人”，吉胆岛则“约五千人”（杨晴川，1950，页51），此与上表所引数据有相当大的出入（然而杨文谓雪兰莪潮籍总数“共二万一千一百九十八人”，则与官方数据吻合，可证他的数据是取自官方的）。两组数据的误差，今天已很难去判断孰是孰非了；在这里是以官方统计数据作为参考基数，以讨论当时存在人口的概貌。

从表一中，可以观察出几点。第一是潮州人在巴生的华人人口比例中是非常低的，数目也非常稀少，这点反映了潮人之进入巴生是相对较晚的；第二，二十年代以后巴生潮人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从1931及1947年的数据来看，其比例上升到二位数，其位置也上升一级到第三位。这点符合过去学者做过的考察，即1921年至1931年以及1931年至1947年是马来亚潮州人增长的两个高峰期，尤其后一阶段（1931-1947），雪兰莪的潮人增长率高达102.5%（郑良树，1982，页63）。然而若单就巴生一区而言，其增长率高过这个平均数据而近达120%。可见战后巴生潮人的激增状况，虽然它在华人总体比数上还是属于少数。

以上总体回顾了巴生潮籍人口的情况，那么在这么稀少的人群中，究竟谁才是最早登陆巴生的潮州人？这点相信已经很难考究了。不过从最近从国家档案馆所挖掘的材料来看，潮州人来到巴生虽然不是很早，但也不算太晚。据学者考据，1917年创办巴生公所的陈文胜，最迟已于1886年从新加坡来到巴生居住下来了（杨建生、王梅清，2017a，页243）。这是目前所知，巴生最早有姓名可考的潮州人⁴。正是这位在巴生经商发迹的潮州先贤，开启了巴生潮州人历史的新页。

二、早年巴生潮人的行业

巴生潮州人虽少却精悍，掌控了地方百货，也出了不少地方人物，为巴生华人社群中的奇葩。

六十年多前，杨晴川对当时雪兰莪的潮州人有过这样的观察：“工商业以潮安、澄海、潮阳等县乡侨占多数；农业以普宁、揭阳等县乡占多数；渔业则几全属澄海县乡所经营，盖与原籍地理习惯颇有关系也。”（杨晴川，1950，页51）

⁴ 在吉隆坡方面，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的潮州人及其商号，是出现于1885年的柯波春及源丰号（詹缘端等，2016，页40-41）。

也就是说，潮州人的职业习惯和其原乡的身分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点就非常典型的显现在巴生与吉胆岛上。所以要考察巴生潮州人的早期历史，其原籍背景与职业就成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巴生与吉胆岛，这两个相毗连的小岛与港城，早年在人口及职业上就存在着非常巧妙的“分工”默契，二者相应互补。凡来自澄海县乡（以外砂为大宗）的潮人大多聚居于吉胆岛，以打鱼贩鱼为业者居多；而在巴生的潮州人则以经商为主，或是兼务农业，在籍贯上则以潮安、揭阳等为多。这点我们从多次的田调和历史口述中得到印证，也与早期文献所载相合。以下再根据1956及1959年巴生滨海潮州八邑会馆的董事会名单，进一步具体分析这些巴生潮州地方精英的籍贯与职业。这份名单为巴生滨海潮州会馆所藏，这里试作简表如下所示：

表二

1956及1959年巴生潮州八邑会馆董事成员资料列表

姓名	籍贯	职业	商号	地址	附注
曾炳梅	潮安	杂货商	同发号	巴生林茂街7号	Rembau Street
陈振猷	揭阳	杂货酒商	广祥兴	巴生林茂街10号	
郭再全	潮安	商	长利	巴生敏街21号	Main Street
陈兴长	潮安	陶瓷商	陈源发	巴生敏街48号	
陈再全	潮安	杂货	陈盛祥	巴生吗吉街21号	Market Street
翁亨华	潮安	商		巴生美鲁律110号	Meru Road
许两诗	潮安	学		巴生美鲁律240号	
蔡寄松	澄海	杂货商	远盛	巴生美鲁律59号	
许传林	潮安	杂货商	新亚公司	巴生林茂街87号	
陈锡江	潮安	铁钢索略	永隆	巴生林茂街99号	
方瑞干	潮安	陶瓷商	广和	巴生林茂街21号	
黄钦海	潮安	杂货商	锦茂	巴生吗吉街22号	
吴国章	潮安	商		巴生里叻西易律32号	Riverside Road
郭希尧	揭阳	商		巴生港口兼律13号	Kent Road
林恭泉	潮安	杂货商		巴生敏街17号	
张庆珊	揭阳	商	隆公司	巴生直落牙弄66号	Teluk Gadung
蔡岳教	潮安	商	松发	巴生加埔律173号	Kapar Street
沈才榜	潮安	米杂商	泰源公司	巴生港口华生律91号	Watson Road
黄景堃	潮安	杂货商	成记	巴生林茂街79号	

陈海裕	潮安	杂货商	乾源	巴生敏街13号	
陈锡存	潮安	杂货商	同发祥	巴生港口华生律 36号	
许戊举	潮安	茶室		巴生马拉街31号	Malay Street
陈先长	潮安	杂货商	陈盛发	巴生港口华生律 52号	
谢镇兴	潮安	杂货商	嘉兴	巴生美鲁律31号	
刘庆隆	潮安	杂货商	合发号	巴生夏吧街10号	Harpers Road
周两来	潮安	杂货米商	同泰祥	巴生敏街8号	
郭廷明	潮安	商		巴生林茂街10号	
王岳龙	澄海	肥皂	万和隆	巴生直落牙弄律 443号	
郭林顺	潮安	商		巴生港口华生律 974号	
陈锦炎	澄海	杂货商	锦丰号	吉胆岛446号	
陈松楨	澄海	杂货商	添发兴	吉胆岛329号	
谢松茂	澄海	商		吉胆岛101号	
谢其泉	澄海	商		巴生港口新村 629号	
谢升发	澄海	商	顺发号	吉胆岛329号	
王两仕	澄海	商	宝珍号	吉胆岛447号	
王转兴	澄海	商	海兴号	吉胆岛327号	
王朝平	澄海	商	联发号	吉胆岛323号	
谭惠藩	澄海	商	四顺号	吉胆岛445号	
郭木仟	潮安	海产		吉胆岛235号	
郭钦兴	潮安	海产		吉胆岛235号	
	揭阳	商	万生隆	巴生港口华生律 7号	
林应仁	潮安	银行买办	渣打银行	巴生直落布来律 25号	Teluk Pulai
林修鸿	澄海	学	兴华中学	巴生直落牙弄律 141号	
许开亮	潮安	书记		巴生峇都的甲律 92号	Batu Tiga Road

陈景声	潮安	古董商	长声号	巴生敏街13号
郭兆东	潮安	入口商	同成贸易	巴生敏街
郭克揆	潮安	商		吉胆岛
谢文桐	澄海	商	聚发兴号	吉胆岛140号
林昭杰	普宁	陶瓷商	大同公司	巴生林茂街
林炳岳	潮安	杂货商	金发号	巴生直落玻璃律
萧汉杰	潮安	杂货商	广丰隆	巴生港口华生律

表二是五十年代巴生潮州会馆董事成员相关背景的一览表。必须说明的，这个列表当然不能涵盖所有巴生的潮人，因为华人乡团的领导层向来多由地方精英与绅商所组成。然而会馆作为早年华人社会的核心组织，其领导层基本上是该社群所公孚与推举的，并常兼顾到次社群的代表，因此这个研究样本仍然有效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及普遍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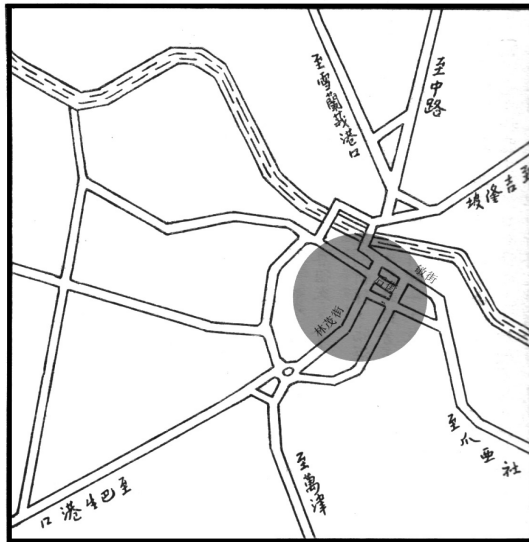
综观表二，我们可对早年巴生潮人概况作一基本掌握。整体而言有三大特点。首先，非常明显的，吉胆岛的董事成员大多为澄海籍的，而巴生潮社则以潮安籍占大多数，其它有揭阳、澄海、普宁等。第二、绝大部分的董事成员都是从事商业的，绝少有工、矿、胶业、种植等。当然，很多华人会馆领导层也类此情况，然而巴生潮州会馆的商人比例之高，应该是较少见的，此反映了巴生潮人从商的比例概况，是高于其它籍贯社群的；再看这些商家所属的行业，除吉胆岛的海产船务业外，巴生市区的潮商实以杂货米粮为大宗，其行业同质性之高，又是一大特色。第三、从经商店铺所在地来，吉胆岛除外的潮商，高度集中在市区里的二条主干大道上，即敏街（Main Street）与林茂街（Rembau Street），其次才散布于南区巴生港口、北区美鲁路等郊区一带。

从第二、三的特点来看，让我们对巴生潮商有更细致的认识。敏街、林茂街是巴生市区最主要的通商衢道，为百货汇聚所在⁵。敏街显然就是上文所引述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唐人街”，这是一条沿着巴生河平行的大道，其尽头（或起点）即连接河岸码头，是早年货物上下卸运的据点，往内路可川行至吉隆坡，向外则出河口至马六甲海峡，可南下北上到马六甲檳城等各地。1886年来往吉隆坡巴生的铁路开通后，巴生市的火车站即设在敏街码头附近。可见这一带是巴生交通的枢纽，扼控往来的人流与货物。林茂街则与敏街交接于码头处，而朝西部方向延伸，这两条大街交结成巴生重要的商业区。我们看巴生第一代潮商陈文胜于十九世纪末所创的“成丰号”，就设在敏街8号上⁶；此8号店屋后来又转至“同泰祥”，其业主也是同为潮安籍的周两来（见表二所示）。潮州人在巴生是极少数

⁵ 另一条马来街（Malay Street）为与敏街相挨的后巷，俗称“后街”，也是一条热闹的商贸街道。表二虽仅见一间潮州人经营的茶室，然而从田调所得，这里也有数间潮商店铺。

⁶ 见国家档案馆所藏编号1957/0109409文献。文献上所载陈文胜的通讯地址为“No.8, Main Street, Klang”（杨建生、王梅清，2017a，页244）。

的人口，然而却高度集中在巴生商业精华地，反映了潮商在巴生贸易活动中的实力。



图一：五十年代巴生市区平面图。圆圈所示为当时的市中心，也就是潮商聚集所在。

上世纪五十年代杨晴川曾谓：“潮侨在雪兰莪州经营商业，以烟酒为最著称，粮食杂货次之，布业又次之。”（杨晴川，1950，页51）这一点也很反映在巴生潮商上。综看表二，巴生潮商基本有几种类型，吉胆岛的潮商虽没说明是何种行业，但相信都与海产业有关；巴生市郊区的潮商，很明显以杂货（含米粮）为大宗，相信也兼及烟酒，例如二战前位处马来街的“经业”，为巴生著名的杂货店，同时也是巴生地区泰国米重要的分销商⁷。

巴生是工商发达之地，四周的农业也很丰盛，早期曾大量种植胡椒、咖啡等经济作物，二十世纪初则大量翻种树胶，在矿产上这里也曾盛产过锡矿。然而综观表二，这几个巴生重要的经济命脉几乎不见潮州人的踪影，主要是由闽粤等籍来掌控。此诚如当时人所言的：“潮侨在雪州虽亦有投资树胶种植业，但实际上属极少数，唯种烟草、木薯、蔬菜、养猪、养鱼等小规模农业，经营者颇多。”（杨晴川，1950，页52）当然也有例外的，例如活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巴生商界的陈文胜，与吉隆坡的朱嘉炳一样，是较少见的参与采锡矿的潮商。据官方资料显示，陈文胜曾投下巨资在橡胶业与锡矿开采的事业上，是称雄一方的巨商（杨建生、王梅清，2017a，页242-243）。在工业方面，除了表二中所见“万和隆”肥皂制造商外，最著名的莫如巴生港口的李金赐火柴厂了，其业主李

⁷ 郭文隆口述。郭文隆，男，1948年生，广东潮安人，采访于2017年9月24日于郭氏住家。

金赐，籍贯潮阳。此火柴厂为早年雪兰莪境内唯一火柴制造工厂，日据时代曾被日军炸毁，光复后又恢复运作，其产品供应雪兰莪、森美兰、彭亨等各州（潘醒农，1950，页51、85）。仅举此二例，可知当年的潮商里也有工商资本家。

总结来说，巴生潮商所经营的，主要还是沿袭由潮州人所垄断的行业，这显然和其原乡籍贯的职业习惯有关。然而，无论是海产还是米粮杂货，都是百姓日常最重要的生活资源，属于比较细水长流的事业。也就是说，巴生潮商很大程度上掌控了巴生地区的民生经济命脉。

三、潮人与早年巴生华社

潮州人善于经商，占据了巴生京菓杂货的主要位置。然而潮人来自文风鼎盛的邹鲁海滨，对于巴生地方与文化的建设，亦积极参与其中。

早年华人社会是一种帮群结构的特征，反映了各方言群在地方上的实力与地位。帮群组织最早结社于隐秘的会党，接下来就是表现在乡团会馆上了。巴生自始为福建永春人的天下，1892年即出现了永春会馆，较后又有海南会馆（1894年）、闽南会所（1904年，即福建会馆前身）等，显示了各方言群移居的先后位置与社会实力。相较之下，巴生潮州会馆的出现相对较晚，可见迟至二十世纪初，巴生的潮籍人数仍是极少数（参第一节的讨论）。

1917年潮州公所创建，可说是潮人的一件大事，可作为巴生潮人社群逐渐成形的重要指标。此会馆乃由陈文胜、陈学芝、黄立芳等人潮领所创建，名为“巴生潮州公所”（THE TEO CHEW KONG SO），最初会址就设在马来街（Malay Street），如上节所述，这一带正是潮人的聚集之地。然而潮州会馆的真正开幕是落在1921年，虽移设于甘榜亚答（Kampong Atap），但离马来街也不算太远。自此，潮州人在巴生总算有个落脚处与凝聚中心；会馆董事部成员保留了一定名额予吉胆岛的潮籍代表，反映了会馆作为维系巴生与吉胆岛两地潮人的重要功能。三十代以后潮州公所逐渐式微，建筑危殆，会务停歇，被官方勒令拆除会所，有被关闭之虞。当时幸有曾任公所总理的郭铭辉担起挽救的大任，积极奔走疾呼，才总算撑住残破的局面，系住一缕生气。在这段落没艰辛时期，郭铭辉所经营的“经业”有暂代会馆的功能，成为巴生潮籍社群网络的中心点。除了因为“经业”的中心位置外，显然也和郭氏曾任公所总理的身分有关。二战日据时期，巴生潮州公所停办。马来亚光复后，始由曾炳梅等人于1947年再次筹组会馆，定名为“巴生滨海潮州八邑会馆”（至1999年再易名“巴生滨海潮州会馆”），进入较为平稳发展的阶段。⁸

⁸ 有关巴生潮州会馆的创设历史，主要参考自《巴生滨海潮州会馆史纲》（徐威雄，2017b），此处从简。

潮州人在巴生仅是极小众，然而公所的成立，让潮州帮群在巴生有了立足点，得以参与或者介入巴生华人社会的事物中。综观潮州会馆的历史，可得到诸多印证。例如参与巴生各华校的筹募活动、赈济本地或中国原乡各种灾难战乱、庆祝官方或民间的节庆活动等等，大多数以会馆名义成为各项活动的负责团体，或是委派代表参与，共同协办（杨建生、王梅清，2017b，页259-267）。也就是说，会馆提供了一个社会平台，让人寡势弱的潮州人凝成了一个整体公意，并以此平台参与了巴生华人社会的活动与建设。至五十年代独立前夕，潮州会馆任“巴生华人社团联合推动申请公民权委员会”之委员（南洋商报，1957，页12），积极参与到全马华人公民权运动里去，成为巴生华人国家认同转变的代表。

从领导人来看，历年来的会长（早年叫总理）往往具为地方性的人物或领袖，让公所（会馆）藉以更深入参与了巴生华人社会。综观其几代领袖，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其中以陈文胜和曾炳梅最为显著。陈文胜为1917年潮州公所的创办人，其事业领域庞大，涉足多方，为雄霸一方的巨商。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创办了潮州公所，也参与华侨树胶公会、巴生中华商会等重要华人团体，担任重要职位，在巴生华人商界里有其重要作用与地位（杨建生、王梅清，2017a，页242-243）。

至于曾炳梅，则是1947年潮州八邑会馆创办人之一，也是第一任会长。曾氏除了是潮领之外，也更是五十年代巴生华社的重要的领袖之一，影响很大。就如陈文胜一样，曾氏以杂货起家，实力雄厚，但因为他与官方的密切关系，让他成为官民之间的中介人，深得华社的推崇与敬重。挟以会长的名分，华社各项事务与活动都有他的参与或挂名，涵盖了文教各领域。他是多所华校的董事（或董事长）、华团的领导或要员，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推动下，参与创办了广东会馆，同时兼任潮州会馆、广东会馆与广东义山的会长，并献议将潮州会馆的一块地产捐献给广东会馆，以作为建设广东会馆的会所（徐威雄，2017c，页74）。也就是从他开始，潮州人成为整个巴生广东籍民的主要代表，历年多由潮人出任广东会馆与义山的领导；也就是说，在巴生是潮州人整合了广东各籍贯，成为与福建帮双峰并峙的两大帮群。这是潮州人在巴生地方史的重要意义。

最后说到教育这一块。潮州人自古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有潮人地方就有读书声，即便如荒凉的吉胆岛在很早前就设有私塾，以延续文化命脉。至四、五十年代潮州人先后在吉胆岛设立了华南、联强（后合并为华联）、南侨、竞智等现代学堂。至于在巴生，这是一个闽南籍为主的城镇，学府主要由福建人或福建会馆所创办，潮州人并未设立过学校。虽是如此，潮州人积极的参与到闽籍所立的华校去，他们或为董事或为教员。例如曾炳梅，也是兴华中学的创办人之一，曾任多所华校的董事或董事长，如兴华中学、共和学校、巴生中华中学及华侨（滨华）中学等等。这样的传统延续到现在，目前巴生四所独中、华文小学等，潮州人任职董事长或董事要职的为数不少，足以反映潮州人对巴生华社文教的参与与贡献了。

四、结语

总结地说，潮州人在巴生地区属于人数极少的族群，大约移居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其中以潮安县为大宗，潮阳、澄海、揭阳等县乡籍的次之（吉胆岛则以澄海人为主）。潮籍擅长经商，大多聚集于市中心的商业精华地段，主要从事杂货米粮等生意，掌控了巴生的民生经济。1917年巴生潮州公所的成立，实为巴生潮人史上的大事，将人寡势小的潮人凝聚为成一个强大的帮群，积极参与介入巴生华社的公益与文教事业，并整合了巴生广东籍地缘群体，贡献极大。以少数的人口而深涉华社各公共领域，足以显示了潮州人在巴生华人历史上重要意义。

最后，本文的一些资料与田调，获得巴生滨海潮州会馆的鼎力协助，谨此致谢。

附录：早年巴生地区潮商商号集录

1) 1908年吉胆岛渔民上书（国家档案馆所藏文件编号1957/0141910），可确定为潮商的有：

森发、义盛兴；

可能是潮商的有：新万兴、永昌、德盛隆、和兴、泰兴隆、新源丰、万安利、金泰兴、金和兴、新合源、三永发、永顺发。

2) 1919年巴生吉隆坡潮商为潮籍渔民申冤上书（国家档案馆所藏文件编号1957/0203882），所见商号有：

恒丰、同丰、陈集成、添成、谦发、谦发兴、成丰、广成顺、福利公司、复生堂。

3) 1921年吉胆岛与五条港渔民上书（国家档案馆所藏文件编号1957/0215455），可确定为潮商的有森发，其他可能是潮人商号的有：

金远利、吕合记、金合成、新成发、三合兴、三水发、联合美等。

（注：以上资料整理，取自《海滨潮乡——雪隆潮州人研究》（詹缘端等，2016））

4) 1955年《马来亚潮侨通鉴》（页275）所记吉胆岛的潮商：

钦兴（鲜鱼）、王海兴、成合、周乾成、和记、承发、思合、振合、海发、通兴、祥兴、杨联记、协益栈、顺祥、聚兴、联发（以上为咸鱼商）、四顺、承源、潮生、锦丰、联记、来兴、协生、顺发、添发兴、谭绍记（以上为杂货网索）、仁昌、仟顺、隆发（以上巴拉尖）、力量、王述记、义和成（以上屠商）、经成发、应成（菜馆）、宝珍（糖果）、寿仁堂（药材）、海利（运输业）。

5) 潮籍乡老许绍堂先生所提供巴生潮商（2016-17年采访）：

南区：

乾源、陈源发（碗、瓷器）、广和（瓷器）、大同（瓷器）、同泰祥（米粮、杂货）、同泰成（饼干、杂咸）、同发（饼干、杂咸）、广祥兴、新亚、成记、永隆、潮茂湖兴饭店、兴业（米粮杂货）、潮汕饭店、正源公司、华友肉骨茶、华成肉骨茶、同成贸易公司、四海贸易公司、俊茂、成利、天一打吗厂、新丰庆、德盛、荣隆

直落玻璃：

南华、裕利、林炳岳

班达马兰新村：

源丰、林开祥、陈海炎、光明

港口：

万生隆（杂货批发、船务）、同发祥（杂货）、盛发（杂货）、广丰隆（杂货）、金和隆（杂货）、泰源（出口贸易）、松记（杂货）

北区：

锦茂、扩记、广源昌、仰兴（木屐）、荣盛（杂货）、钦记、大川（瓷）、利公司、再乾成、嘉兴、成源栈、正茂、就成、安隆饼家、远盛、潮盛、荣兴、吴树藩面线厂、泉发、正发、振发、忠成、许中、裕生新记、远发、奋发、就发、松发、益生（寿衣）、两成（帆布）、艺兴（机械）、陶裕成（瓷）

参考文献

陈剑虹。（1997）。〈甲必丹时代的吉隆坡华人社会〉。收入李业霖主编《吉隆坡开拓者——甲必丹叶亚来的一生》。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潘醒农编。（1950）。《马来亚潮侨通鉴》。星加坡：南岛出版社。

徐威雄主编。（2013）。《移山图鉴：雪隆华人历史图片集（下册）》。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徐威雄。（2017a）。〈雪兰莪滨海潮州人移殖史〉。收入徐威雄编《潮涌百年——巴生滨海潮州会馆一百年纪念特刊（1917-2017）》。巴生：巴生滨海潮州会馆。

徐威雄。（2017b）。〈巴生滨海潮州会馆史纲〉。收入徐威雄编《潮涌百年——巴生滨海潮州会馆一百年纪念特刊（1917-2017）》。巴生：巴生滨海潮州会馆。

徐威雄。（2017c）。〈曾炳梅〉。收入徐威雄编《潮涌百年——巴生滨海潮州会馆一百年纪念特刊（1917-2017）》。巴生：巴生滨海潮州会馆。

杨建生、王梅清。（2017a）。〈围绕在1917年巴生潮州公所的一些史记〉。收入徐威雄编《潮涌百年——巴生滨海潮州会馆一百年纪念特刊（1917-2017）》。巴生：巴生滨海潮州会馆。

杨建生、王梅清。（2017b）。〈1947年之前的巴生滨海潮州会馆馆史补遗〉。收入徐威雄编《潮涌百年——巴生滨海潮州会馆一百年纪念特刊（1917-2017）》。巴生：巴生滨海潮州会馆。

杨晴川。（1950）。《雪兰莪潮侨概况》。《马来亚朝侨通鉴》。星加坡：南岛出版社。

叶美霞整理。（2017）。〈雪兰莪暨吉隆坡华人与潮籍人口统计表（1901-2010年）〉。收入徐威雄编《潮涌百年——巴生滨海潮州会馆一百年纪念特刊（1917-2017）》。巴生：巴生滨海潮州会馆。

詹缘端、徐威雄、童敏薇。（2016）。《海滨潮乡——雪隆潮州人研究》。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雪隆潮州会馆。

郑良树。（1982）。〈潮州人之人口及其分布〉。收入氏著《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史论丛（卷一）》。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

“巴生成立华人社团申请公民权委员会”，《南洋商报》1957年11月19日，第12版。

J.M. Gullick. (2006). The Fall And Rise of Klang, 1867-1900, *JMBRAS*, 19(1).

Mohd. Sarim Hj. Mustajab & Khazin Mold. Tamrin. (1990), *Klang 1890-1990, Sejarah dan Pentadbiran*. Klang: Pejabat Daerah dan Majlis Perbandaran Klang.